



历史尘烟

双城子女真石乌龟

□许志杰

吸引我去双城子的是城里一尊女真石乌龟。

如同伯力、共青城、庙街、瓦尼诺,俄罗斯人也给双城子起了一个俄语名——乌苏里斯克,一听便知与乌苏里江有关。不错,双城子位于乌苏里一兴凯湖平原南头,乌苏里江中游地带。渤海国灭亡之前,曾是这个东北亚大国的重镇,明代始设双城卫,东城富尔丹,西城朱尔根,两城相距四公里。满族人占据双城卫之后改名富尔丹城,满语双城堡,汉语双城子由此演化而来。双城子西与中国东北地区腹地相连,南北各距百公里就是海港城市海参崴和远东地区最大城市伯力。

清王朝统治中原之前,这里实打实就是咱的地,满族先祖女真人世代于此聚落,打鱼、打猎、伐木为生。1689年,就是清王朝逼死明皇崇祯45年之后,与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被清王朝及其吹捧者誉为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平等条约,实质是清王朝统治者丧权辱国、赔款割地的开始。清王朝一约障目,自得于《尼布楚条约》换来的所谓百年安生机遇,对汉族地区民众采取血腥镇压、武力降伏的手段,平定中原。岂不知,扩张与侵吞上瘾的沙皇俄国,眼见清王朝被一纸《尼布楚条约》放倒,便打着“哥们儿”的幌子,开始对黑龙江中下游以及方圆数百公里乃至更广袤地区进行勘察、探险等非法活动。俄人一打眼看上的就是扼守交通要道的双城子。《尼布楚条约》签订不久,他们便在东城外围筑土为营,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赫哲人、靺鞨人驱赶,移来大量俄罗斯等族人,伺机全面霸占远东地区。

时机在1858年出现,清王朝鼓吹平等互利的《尼布楚条约》签订169年之际,俄国人摁着清王朝的脖子签下《瑷珲条约》,1860年又秘密订立《北京条约》(又名中俄《续增条约》),包括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国土被清王朝拱手让予沙皇俄国。本来,这次割地限东以大海分治,陆地还是清王朝的。不承想,清王朝统治者为讨好俄人,竟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边大片土地,以“不毛之地”为由双手捧给沙皇。俄人开始修建双城子到海参崴和伯力的铁路,分别于1893年和1897年建成通车,将圣彼得堡到远东地区的火车一直开到海参崴,中国失去了日本海的出海通道。双城子从此成了俄人的土地,俄人1866年改双城子为尼古拉斯克,后又叫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基市,苏联时期改为伏罗希洛夫市,1957年定名乌苏里斯克。俄人治下,乌苏里斯克当然就没了东城、西城之分,双城子成为仅存于中国人心中的一块疤痕,记得住,看不见,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双城子的女真石乌龟显得格外意义非凡。按图索骥,我们找得很苦。从地图看,石乌龟安放在一处叫做市民公园的儿童乐园里边。来到公园,眼前的景象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这里是市民公园,更不像祖国花朵娱乐的儿童公园。原来的大门已经堵死,照着地图指向的石乌龟走过去,此路不通。公园的围墙歪七扭八,苏联时期做在石墙上的雕塑、标语斑驳不堪,却仍可辨识,由此想见,当年公园还是十分繁盛与热闹的。终于找到了大门,挺高大,是那种典型的苏联时期的高大上,只是今不如昔,风吹雨打花落去,剩下的就是几根钢筋在吃力地支撑着。倒是玩耍的孩子们无忧无虑,非常开心。俄罗斯人的娱乐精神还是有的,在我们看上去已经很不成样子的环境中,他们依然保持着最大程度的乐观与容让,耐力与耐性惊人。如

同当年他们不远万里从西欧洲迁徙到自然环境恶劣的西伯利亚远东求生,韧劲十足,求生的欲望更足。

闹中取静,我看公园一处僻静之地,有似于中式的亭子,亭子下一尊庞大的什物静卧于此——是的,这就是我要找的那尊传说甚久、传说很多的女真时代石乌龟造像。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作为满族的先人,兴起于九世纪的女真,遍布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牡丹江流域。十二世纪初,女真各部联合起来抗击契丹族辽王朝的残暴统治,建立女真人的金王朝,领导者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女真完颜部头领阿骨打。女真人没有文字,记事、传达命令靠刻木为契。阿骨打虽无什么文化却挺聪明,善于研究点儿事,就领着几个人借助契丹文、汉文字,创造了属于女真人自己的女真字,叫女真大字。经过文字改革,简化笔画写法,形成新的文字,史称女真小字,从此与契丹文在东北地区并用。包括明王朝给女真金王朝的敕谕居然也用女真字书,说明女真文字影响之大。直到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王朝,因女真文字不易学懂,便用蒙文字母创建老满文取代女真文字。

女真文字在东北远东地区通行的时代,曾留十余块女真文石碑,分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最著名的是永宁寺碑和重修永宁寺碑。永宁寺碑全称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立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一年(1413年),亦称永乐碑。因其初设于奴儿干都司所在地特林永宁寺,因而又称永宁寺碑。因为有永宁寺,当地人习惯地把特林叫做庙街,意思是一个有庙的街,庙街由此而来。碑身刻有女真文字、蒙文和汉字,宣传明王朝安抚边疆各族人民的功德,选“永宁”二字祈愿奴儿干地区的各民族永远安宁、昌盛繁华。立永宁寺碑19年之后,明王朝钦差再次来到奴儿干地区的庙街,发现永宁寺被毁,永宁寺碑尚在,永宁寺的基座也在,于是重修永宁寺,立重修永宁寺碑,用汉字、女真文字、蒙文镌刻碑文。两碑建于明王朝宣宗、宣德年间,后世又有宣德碑之说,是明代管辖黑龙江下游流域奴儿干地区以及远东海域的重要物证,具有相当高的历史文献和法律价值。

以上所述之,史书有记,很多去过奴儿干的人亦曾亲眼所见。清末地理历史学家曹廷杰光绪十一年(1885年)春曾到黑龙江下游考察,到过庙街,他在《西伯利亚东偏纪要》写道:“上有明碑二:一刻敕建永宁寺记,一刻宣德六年重修永宁寺记。”曹廷杰还将碑文记了下来。另有清初爱国诗人王兆骞见过,入侵这一地区的俄罗斯哥萨克士兵见过,偷摸来此考察的日本人间官林藏也见过,并写进了他们自己的文字。此后无人再见,两碑去向成谜。在清王朝将大片祖宗留下的土地让给沙皇后,俄人对原有的物证、人证血腥清理,使该地变成一张白纸,任其挥笔涂鸦。双城子女真石乌龟,成为留存至今唯一见证历史巨变的物证。其实,这只是两块明碑的底座之一。前些年突传重修永宁寺碑现身海参崴的某一条小街上;又有人放言,重修永宁寺碑已被收藏于海参崴地方博物馆。凡此种种,却始终未有人见过石碑真身。俄罗斯人三缄其口。当然,这尊女真石乌龟本身也留下了诸多疑问,它真的是永宁寺碑或重修永宁寺碑的底座吗?如果是,怎么从庙街来到双城子的?设若不是,那么至少可以证明双城子本地还有女真时期的石碑,现如今它又在哪里呢?千年的石头会说话,相信终有一天真相会光昭天下。

惟愿石乌龟长在,留给子孙一些念想。

□孙葆元

中国的送别文学题材今日已经很少见了,翻一翻旧章,送别的诗篇触目皆是。送别为什么与诗结下不解之缘?送别匆匆,在挥手之间,无限话语却在心头,唯有诗一句千言,藏着诉说、嘱托、期望与祝福,是送给远行人最好的慰藉,于是形成中国独特的送别文化现象。

人生喜欢团聚,生活总有离别。离别是对团聚的打碎,是生活里的伤感。苏轼以月喻人生,说“月有阴晴圆缺”。柳永更是一语点破离别之苦:“多情自古伤离别。”送别诗当年是送给特定的友人的,流传下来却成为前人送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

最早的送别诗是三千年前《诗经》里的《国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这是父母送别出嫁女儿的诗,生养女儿十余载,一经远离,送到郊外,看着女儿越走越远,父母飞泪如雨。诗的开头以燕子起兴,寓意深远,燕子在头上飞舞,飞走了又绕回来,远去的女儿你能回来吗?何其复杂的别情,有断肠之伤、人生的无奈,当然也有岁月赠予的欣喜。

汉朝诗歌多苍凉,最著名的离别诗是《苏李诗》。李陵与苏武在长安作别,李陵起舞作歌送诗三首,第三首曰:“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恨恨不得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苏武则答诗四首,“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他用树的枝与叶比喻送别双方的关系。紧接着他又说,“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继续用“黄鹄远行”和“胡马失群”来比喻心中送别的失落。汉诗多叙事,像这样直接写情感的不多。这一组诗争议颇多,也有苏轼、洪迈、杨慎、顾炎武、翁方纲等历代大家认为是别人所托之作,但不管怎样,这

的送别可以看到真挚的友谊。中国传统的交友讲求知交、知己、知心,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实用性,而是精神的融通。有多么深情的离别,就有多么深厚的知交,怎能不出写出断肠般的诗句?

与“海内”和“天涯”同辉的是“冰心”和“玉壶”“青山”和“明月”。唐天宝元年,五十二岁的王昌龄出任江宁丞,在芙蓉楼送别故人辛渐,赠诗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在送别诗中加上明志的话语。“洛阳亲友”是谁?他十三岁至二十四岁,结网于川隅,在故乡长安灞上过着渔耕的生活,三十七岁考上进士才跨入仕途,在此之前结识了李白、孟浩然、常健、王维、高适以及渔耕中人,他指着寒江中的冰晶,请辛渐给这些朋友捎话:我对故友的心一如此冰,装在玉壶里,晶莹剔透。多么无瑕的情谊,为千古留下绝唱。六年之后李白从齐鲁大地赶往金陵拜望他,李白比他小十一岁。没想到王昌龄以“不护细行”之罪贬谪龙标,即今天云南的黔城。李白为王昌龄写下送别诗:“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情感一尘不染!王昌龄在云南呆了四年,已经六十二岁高龄,送他的朋友柴侍御到武冈去,临行写下:“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何其真挚,何其伤神,与朋友的友谊是装不出来的,同处天涯间,两乡亦比邻。

宋代是词的时代,提到送别便想起柳永的《雨霖铃》:“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这首词是他临行前与歌妓的告别,他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手,他的词作是靠歌妓的演唱流传的,因此与她们之间有着深深的依恋,柳永为她们留下了“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的留念。柳永一生穷困潦倒,死后无钱安葬,是歌妓们凑钱安葬了他,那最后一抔土应是歌妓们对他的送别吧?

然而宋词里最让人感慨的是张元干写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张元干曾任太学上舍生、陈留县丞。秦桧当国,他不与为谋,弃官而去。不久枢密院编修胡铨上疏宋高宗反对议和、请斩秦桧,被人诬陷,先贬昭通再贬新州。张元干闻讯,不顾个人安危从福州赶到杭州送行,留下这首词:“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官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在送别诗中直接谴责那些误国害民的“狐兔”,又是何等悲怆的送别!这首词让秦桧震怒不已,张元干因此被抄家入狱,剥夺名籍,为一场送别付出了惨重代价。

当下已难见送别诗,使这一文化传统式微。我思考个中原委,以为我们大概太注重物质生活,在送别中以物易情,哪有真情?还有就是我们太习惯于以一种模式语言表达,失去了肺腑之言,那些送别就成了人生过场。

独特的传统送别文化



组诗足以看出送别诗发展到汉代对于兴比赋的运用。

唐代的送别诗进入创作高潮,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几乎都来自这个时代,唐人以诗为礼,以情为礼,又以诗载情,送上的是一生中珍贵的留恋与记忆。即使以物相赠,也是自然界中具有比拟特征的物品,如红豆,喻“此物最相思”;或柳枝,折柳相送取一个“留”字。最著名的送别诗当数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王勃大约二十二岁,在虢州参军任上送别一位杜姓朋友到蜀州赴少府之任,两个年轻人惜别于长安城外,他的朋友哭得忘形,王勃劝他,人生多“歧路”,不要哭得像个小孩,他殷殷地劝解:“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次经典的送别成为千古佳唱,多少人在离别时吟诵着它在歧路分手,又吟诵着它走向各自的远方。比邻天涯的知己是一生心中的寄挂,从真情